計劃性的田野考察與文物蒐藏：中研院民族所 1950-60 年代的研究工作

吳燕和 *

一、前言

本文為 2012 年 5 月 23 日吳燕和教授於中研院民族所「午餐時間」系列演講之精華。此版文稿由郭佩宜重新編輯，以許善惠整理的逐字稿為本，經吳教授審核確認。大致依照吳老師原本演說順序，輔以剪裁、段落調動、精鍊與補充，以方便讀者理解。出版之圖片整理由楊紹紘協助。吳教授長年在國外，演說有時夾雜英文單字，本文為維持流暢轉為中文。演說原題「計劃性的田野考察與文物蒐藏」，本文增加副標「中研院民族所 1950-60 年代的研究工作」。

圖 1　吳教授娓娓道來過往在民族所的工作，神采奕奕。
（民族所博物館提供）

* 於夏威夷大學東西文化中心退休，今仍擔任兼任教授以及高級研究員。建議參考吳燕和著作《故鄉・田野・火車：人類學家三部曲》（2006）和《ふるさと・フィールド・列車：台湾人類学者の半生記》（2012），其中內容有珍貴的民族所歷史相片。

圖 2　演講當天民族所同仁參與非常熱烈。
（民族所博物館提供）

主持人郭佩宜：

各位同仁大家好，歡迎參加今天的午餐時間演講。很榮幸有機會跟大家介紹前輩吳燕和老師，相信很多同仁對他都很熟悉。吳燕和老師是民族所兼任研究員，之前任職於夏威夷大學東西文化中心，退休後繼續擔任兼任教授以及高級研究員。吳教授今天有備而來——如大家所見，老師追求完美，直到最後一秒都還在修改簡報。聽說今天很多人出席是期待老師要「爆料」，那就先賣個關子，精彩可期。

吳老師與民族所的淵源超過五十年之久。他在 1958 年進入民族所，擔任創所所長凌純聲先生的助理，開啟了人類學之路。隨後就讀臺大考古人類學系，畢業後前往夏威夷大學攻讀碩士、博士，之後因獲得澳洲國立大學的獎助金，前往巴布亞紐幾內亞的 Rabaul 研究當地華人的商業表現，於 1974 年取得澳洲國立大學人類學博士學位。吳老師不僅是臺灣學界在太平洋研究方面的先驅，也是離散華人研究領域中非常重要的學者；除了巴紐之外，他也曾經在臺灣、香港、東南亞等地研究離散華人社群。吳老師除探討海外華人的商業行為和文化，之後也將研究領域延伸到華人的醫療以及飲食文化等議題，近年並出版許多飲食文化相關的著作。吳老師不僅是人類學家，同時也是美食專家——然而作為一位人類學家，他也是能夠在麥當勞蹲點、吃炸雞薯條來做田野的呢！（且身材還保持這麼纖瘦）

在創所初期，吳老師就參與中研院民族所計劃性的田野調查和博物館文物蒐集工作，這是他今天主要「爆料」的主題。他所參與的田野工作，從南到北、從屏東到桃園，涉及許多族群。今天的演講除了本所創辦人凌純聲老師對於臺灣原住民文化的整體研究視野，也會談到早期計劃性田野調查的規劃，以及民族所博物館創建蒐藏的過程。此外，也包括他本人在南澳、花蓮和太魯閣等地豐富的田野經驗。

話不多說，請大家給吳老師熱烈的掌聲歡迎。

吳燕和：

謝謝佩宜。你說我有備而來，但我其實沒什麼準備，今天主要是來講故事。如你所說，我與民族所的關係已經五十多年，在座諸位一定會以為我已經不在了——畢竟都已經五十多年了，怎麼可能還在？假如在民族所工作五十多年，不是走不動，就是已經不在了吧。

今天所要「爆料」的內容，是關於民族所創辦初期的故事，當時我高中剛畢業，在一個很奇怪的情況下來到民族所籌備處工作。民族所的創所人，是許多臺灣重要人類學者的老師——凌純聲先生。對我來說，凌純聲先生作為一位人類學家，不但全能，更常能以非常宏觀的視角看待世界，他的眼光和才能，為臺灣的民族學和人類學界貢獻良多。第一部份許多的「料」，就是與凌純聲先生有關。

1958 年，我來到民族所當他的助手，第二年我聽從他的指示，第一志願報考臺大（考古）人類學系，考上後我持續跟了老師四年，畢業後到出國攻讀博士前，又在老師身邊工作四年。由於長時間的相處，我得以觀察到老師為人處世的態度以及非常宏觀的視野。這部分比較難直接切入探討，因此今天演講的第一部份，我所聚焦的不只是凌先生，還包括其得意弟子，以及第一批在民族所籌備處工作的人的情況。

第二部分，則將談我跟任先民先生一起進行田野調查的種種。那時我可說是每個人的跟班，因此凌先生派我跟任先生一同去進行調查，先到各地觀察，安排與規劃後續的田野調查工作。我後來才瞭解到，原來凌先生想要在臺灣進行大規模的民族學調查。在此也很感謝博物館館員，特別是許善惠小姐能夠找出我年輕時的照片，因為我自己一張都沒有留存。當初任先民先生帶我一起做了三次田野工作，很多調查工作是我做的，可惜的是我並沒有看到最後的成果。透過這次演講，我也想給大家看看早

期作為一位民族學者的助手，都在做哪些工作。我也沒想過當時跟任先生進行田野調查的成果，後來會產生那麼巨大的貢獻。現今民族所博物館許多的排灣族木雕、祖靈柱，就是當初在屏東採集並運回到館內的成果，其中也包括當初凌先生尊稱為「老佛爺」的佳平部落的國寶祖靈柱。我今天也會報告當初怎麼將這些文物採集並運送回臺北的過程。此外還有我所參與的阿美族和泰雅族大型田野調查計劃，我會講述許多田野故事，包括當時的參與者以及調查情況，以及我所進行工作內容。最後簡單的報告我在出國攻讀博士前，在臺東金峰鄉及東臺灣各地所進行的調查。那我們現在開始。

二、凌純聲先生與其宏觀的視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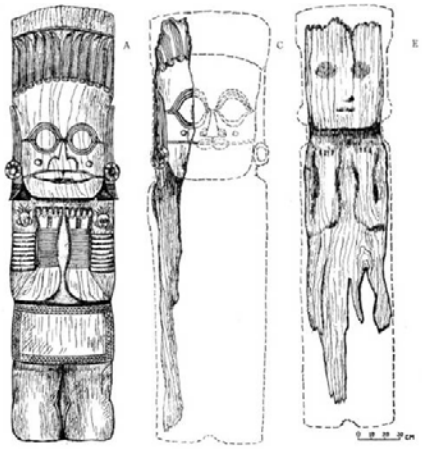


圖 3　佳平 mulidan 祖靈柱
（吳燕和繪，凌純聲 1958: 12）

這張圖（圖 3）是凌先生早期發表的論文裡面的插圖，是在下畫的。這就是我所說的老佛爺，大家一定知道這是國寶。當時我一個高中學生，怎麼有資格進入民族所？為什麼沒有讀大學卻先來工作？我六年前寫了回憶錄《故鄉、田野、火車》，其中提及我從小非常喜歡畫畫，從小學到高中，繪畫都受到老師高度肯定。到了我考大學那年—— 1957 年，當時臺灣僅有五、六間大學——考試前要填寫志願，我選擇成大建築系，第二志願則是師大藝術系。可是考試成績不夠好。當時聯考制度為甲乙丙組，就乙組來說我的文史成績（如英文、中文）不錯，但當時教育部長張其昀（他是

凌先生的好朋友，文化大學的創始人，蔣總統身邊重要的文書官）突然心血來潮，說要學美國通識教育，打破分組加入物理和化學等考科——我的化學考五分、物理三分、數學十分，總分加起來只考到東吳大學法律系。我沒有能力去讀法律系，就開始在臺北找工作。

後來找到任先民先生幫我，他說正好團隊缺一個會繪圖和照相的，覺得我可以試試看。經過試畫後，他帶我去見凌先生，凌先生叫我寫字等試做些工作，即要我下個禮拜就來上班。我得到一張胡適院長的聘書——現在大家恐怕找不到幾個人還有胡適院長的聘書吧？我的職位是技佐，就是助手的意思，低於技正，比技工大一點。

凌先生不知道為什麼特別照顧我，對我很好。凌先生也會叫我看幾本書，我心存感謝，因為我當時甚麼訓練都沒有，但是已經看過凌先生的《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我把所有日本的蕃族調查報告書都拿出來看，越看越有趣，還有一些十九世紀的德國民族學報告，看不懂還是翻著看，也有一些非洲的民族誌。

（一）民族所初期的日常

我剛進民族所時，所裡的助理研究員和助理員只有幾位，李亦園先生剛剛離開去美國讀書，所內還有任先民、文崇一。文崇一是歷史系畢業的，研究韓國的古代歷史，他發表的文章、地圖等都是我畫的。所裡還有個女研究員溫遂瑩，是印尼華僑。此外還有兼任的林衡立先生和衛惠林先生。我的回憶錄裡有不少篇幅寫林衡立先生，他當時非常勇於問問題，但他講話沒人聽得懂——因為他在日本出生，是板橋林家的小孩，南港有間水泥公司（編按：可能為林燈慧創辦的「國產建材實業公司」）也是他們家的。他的母語是福州話，我記得他的臺灣話是後來才學的。林衡立先生大約三十幾歲從日本回到民族所，他寫的文章也沒人看得懂，是用日本式的古代漢文，很多人都知道我們所有一位會寫天書的研究員。一開始他以為我是鄉下來的小孩，想跟我講臺灣話，但我也聽不懂，我就跟他講英文，他很高興，發現原來我們可以用英文溝通。衛惠林先生也是講日文的，可以幫他再翻譯一下，否則林先生講話沒有人聽得懂。

當時還有一位助理研究員鮑克蘭（Inez de Beaulair），老一輩的同仁應該還見過她。她是奧地利貴族，二次大戰之前就到了中國大陸的西邊，到貴州研究苗族。她算

是凌先生的朋友（透過朱家驊），凌先生邀她來民族所工作。凌先生平常跟我講話是講江蘇國語，跟鮑克蘭講一點中文，講不通就講法文。

一開始民族所籌備處借了近代史研究所樓上的空間，在胡適紀念館對面的位置（現在已經拆掉）。那棟房子有兩層樓，樓下是近代史研究所，樓上分我們一半，另一半放近史所書報。過了幾年，大概我大學四年級的時候，民族所自己的辦公室才正式動工，是一間很大的、中國古典式的房子，外觀像是廟，院裡的同仁稱之為「大廟」。一進民族所的大門看到祖靈柱，樣子很像凌先生——他戴眼鏡，眼睛很大，塊頭又很大——我朋友鄭格（我和大家叫他 Tei 桑，因為他講日語），就曾被嚇一跳。

到了「大廟」以後，凌先生很威風。當時民族所十幾個人都是助理員，也有幾個是助理研究員，我則是助手。一開始我們都住在宿舍，宿舍就是現在民族所的位置，是單身宿舍，但沒有空間給我住，所以在放標本的倉庫裡擺一張床給我，吃飯則在靠門口這邊的飯廳。吃完早餐差不多八點半，到辦公室後開始看報，工友李朝軟會趕快倒水倒茶給大家喝。差不多八點半的時候交通車從臺北抵達，進來更多人。凌先生更晚一點，因為他搭一台小轎車，是幾個所長合坐，包括（史語所長）李濟先生，以及植物所和化學所所長。時間差不多時，有人會大喊：「（臺語）所長來矣！所長來矣！」大家就會趕快回到辦公室，並保持安靜。而後凌先生走進來，一坐進辦公室，會用濃厚的腔調喊「鄭格」，鄭格就會跑過去，然後站在凌所長旁邊一直發抖，不知道為什麼。

凌先生一個禮拜只來兩次，好比說星期一或星期五，臺大那邊上課也只去一次。他平常不來的時候可熱鬧了。那時還在借用近史所的空間，近史所有很多的女助理員，還有很多暑假打工的人。當時除了李先生出國外，所有的助理員和助理研究員都還沒結婚，都在談戀愛，或是追求女朋友。凌先生只要不來的時候，大家都很快樂。我晚上工作到很晚，還要準備重考大學，讀書讀到半夜。我發現到了晚上，文崇一先生、溫遂瑩小姐和其他人，都有男女朋友來會面。我在用功讀書，但他們都不在，關起門在他們的研究室裡「研究」。

我們晚上工作到很晚，早上有時候起不來。有次凌先生突然心血來潮星期三來，那個時間點我還在宿舍睡覺，有人跑來大喊：「（臺語）所長來矣！所長來矣！較緊咧！所長來矣！」

凌先生講話很有威嚴，塊頭又大，因此對外交涉、申請錢等比較有力。而且凌先生做過大官——他做過南京內政部邊政司司長，所以很懂吃，是個美食家。凌師母是當時所內師母中最會做菜的，也是有名的美女。我們很幸運當他的學生，每學期都會請我們到他家吃一次飯。那時老師有導師費，就拿來請我們吃飯。

（二）凌先生帶領的田野調查、文物「採集」與比較研究

圖 4　吳燕和、任先民與當時大頭目 Maljeveljev 及報導人合影[1]

這張照片（圖 4）你們應該知道哪個是我吧？除了我跟任先民先生（左），中間這位老太太是泰武最大的貴族家，是現在頭目的母親，我等會再詳述。我們去那裡邊做了三次調查，中間還進到大武山，花了一個星期到老的舊部落。

凌先生的資料蒐集，我認為受到 20 年代法國風氣的影響，當時民族學跟藝術界是串聯在一起的。如畢卡索和高更，當時許多藝術家到太平洋，想要從原住民的藝術裡面吸取經驗，有些早期的印象派是從民族學標本中發展出來的。當凌先生去法國學民族學時，老師裡面有一位到非洲考察，報告裡面提到不只是騎馬，而是用駱駝跟大象載著他的器材一路這麼下去。凌先生當時要我們到南部去調查，大概也是這樣的想法，要派我們到處去「探險」。

1　任先民攝影；吳燕和協助調查；傅君編輯（任先民、吳燕和、傅君　2012: 126）。

我跟凌先生出去過兩次，到泰武跟來義。任先民先生是所裡的管帳，凌先生則是帶著鄭格，因為鄭格會日文，可以充當臨時翻譯。我們當初最豪華（的出差）就是坐剛剛出來的觀光號——還是莒光號，是夜車。我們晚上從臺北出發，第二天早上到高雄。那輛列車非常豪華，有臥鋪。任先生還很壞的要我不要多嘴，因為臥鋪兩張床，他安排讓鄭格跟凌先生睡一間，而我則跟任先生睡。為何如此安排？因為凌先生睡覺的打鼾比火車的聲音還大！第二天一早，鄭格說他晚上都睡不著，不是火車吵，而是凌先生打鼾聲太大。

我們先到高雄住一晚，第二天再坐火車到潮州，到潮州還要住一晚。我在回憶錄中也提到，我跟凌先生在旅館裡洗澡，裡面是日式大澡堂、公共浴池那種，鬧出很多笑話。想不到凌先生平時這麼威嚴的人，在那時候變得好有趣，跟我講了很多有趣的事，還帶著我去潮州看電影。碰巧演的是《亨利五世》（Henry V），是法文電影，底下有人用臺語進行解說。沒有解說我也聽不太懂，一半英文、一半法文，凌先生聽得懂不懂我不知道，只是看一半，他就說：「夠了夠了，我們回去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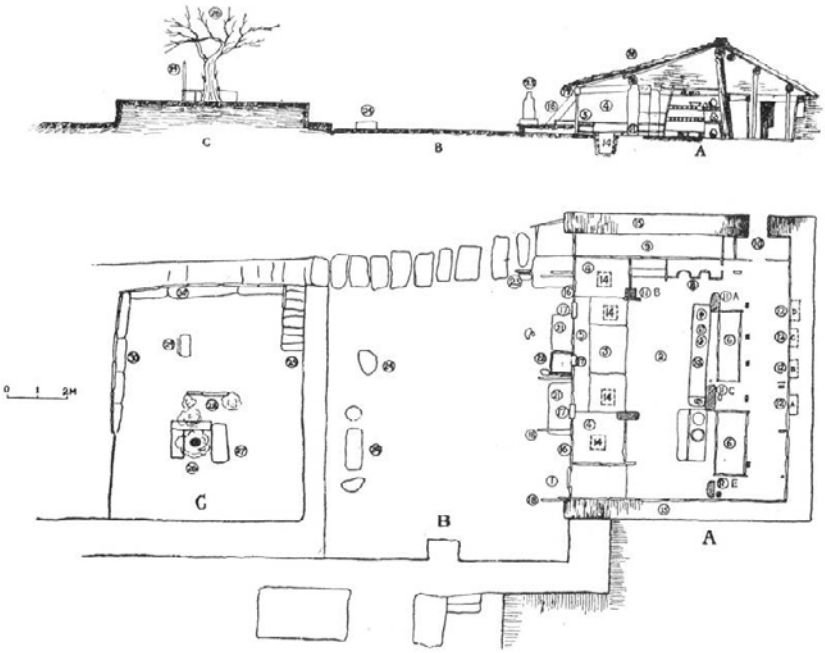
然後到了來義，到了部落裡面，大家都對凌先生非常尊敬。

我要強調，凌先生「宏觀的視野」，除了搶救民族學的材料，他還試圖用民族學和這些標本，理解整個臺灣跟古代中國、太平洋，甚至是中南美洲的關係，他的興趣非常廣，很有意思。你們知道他是 Mauss 的學生，但他跟功能派似乎毫無關係，反倒變成傳播論者。我知道凌先生的考古學知識非常好，我也跟他學過史前史的導論，他能夠從東北的史前巨石聯想到韓國、日本和臺灣。

我大學畢業以後開始來所裡做助理員時，凌先生要我介紹同學中比較聰明的到所裡來，所以我同學大部分都有來工作。我的同班同學陳春欽和學弟許嘉明是我帶他們來的，這兩位都是講臺語的。但是陳春欽和凌先生沒辦法溝通，因為陳春欽的國語凌先生聽不懂，凌先生的國語陳春欽聽不懂，三個人一講話，凌先生就說「翻譯翻譯」，要我來翻譯陳春欽說的話。許嘉明的國語講得好一點，他的塊頭很大，凌先生要他去研究巨石文化，凌先生要他從這裡到基隆之間到處走，只要看到石頭就記錄下來。不只是「土地公」，「石頭（臺語）」都要登記和照相，看這個文化一路可以到那裡。後來則派我去研究排灣族。

凌先生對整個玻里尼西亞很有研究，例如這張投影片（圖 5），傳統家屋前面一

定有石台，與宗教有關。凌先生看到就說「*malae*、*malae*」，是玻里尼西亞的詞語。我問什麼是 *malae*，他說是「牛」——但其實他想講的是「廟」（口音問題），從排灣聯結中國古代的「廟」，夏威夷則是 *malae*。然後他就叫我去研究排灣族的海神。我跟他修了一年的玻里尼西亞文化，看了不少書，對神話非常有興趣，這也是為什麼我後來到夏威夷的原因之一。



插圖壹　佳平社大頭目金果祿家的宗廟與社稷

Fig. 1　Ancestral house and Earth altar of Big-chief Jingurul, Kabiyan.
上圖：側面　Top: side view　　下圖：平面　Below: plan

A. 祖屋 ancestor house,　B. 前庭 front court,　C. Earth altar,

①入　口　entrance
②正　室　main section
③前　室　front section
④寢　床　bed
⑤長　凳　long bench
⑥穀　倉　granary
⑦櫥　架　shelf
⑧灶　　stove
⑨厠所(兼作豬圈)privy (also used as pigsty)
⑩側　門　side entrance
⑪祖　柱　carved ancestral post
⑫祭　檯　altar
⑬靈　龕　spirit niche
⑭墓　坑　grave
⑮石 疊 牆　stone laying wall
⑯石 板 牆　slate-slab wall
⑰窗　　window
⑱撐　柱　leaning post
⑲軒　桁　eaves beam
⑳屋　頂　roof
㉑石　登　stone bench
㉒祭　田　sacred field
㉓前庭石表　court stone pillar
㉔前庭石檯　court slate-slab table
㉕石　階　stone steps
㉖社　樹　sacred tree
㉗登檯或石櫈　stone bench
㉘石　垣　stone wall
㉙壇上石表　stone pillar of altar
㉚石凳背凳　stone bench with back-rest

圖 5　佳平社大頭目金果祿家宗廟與社稷（凌純聲 1958: 8）

凌先生叫我去讀玻里尼西亞的書，我發現他想談排灣族的貴族也有 *mana*；後來我跟（故妻）王維蘭寫過一篇文章〈臺灣排灣人魔眼神話與波利尼西亞馬納信仰初步比較〉（1996），裡面提到在東臺灣的傳說中發現古代眼睛會發火光的排灣貴族魔眼人 Palji，有很特殊的 *mana*。佳平「老佛爺」的大眼睛，也與此有關。

1956 年在大武山下，從舊的泰武（佳平社）要遷村時，把古老的雕刻都搬下來。其中「老佛爺」是在我來所之前就已經搬下來，有些則是在我來以後，陸續從泰武鄉搬到所裡。例如黃樹民所長現在的所長室那一塊凹凹凸凸的木雕，原來是放在人家家門口。那塊木雕運回來時原本不是黑色，我們認為雕紋不凸顯，怎麼辦？軟仔（工友李朝軟）很好，他說：「我負責！」然後去找黑皮鞋油，把木材漆得很漂亮。我相信木雕很多都是經過他的黑皮鞋油處理，而非使用漆木頭的漆。

話說回來，凌先生的視野太廣，有時心急做了一半，所以也常常出現問題。例如他有一篇文章關於吐舌人像（凌純聲 1956: 143-148），提到毛利的雕刻，以及在排灣也發現此種人像，就有些問題。為何我會知道？因為論文中的插圖是我幫他畫的。當時我還沒進臺大，看了很多，我懷疑排灣的雕像是日本人做的，歸為排灣傳統文化的表現可能有問題，但凌先生太忙了，很快就都寫進文章裡了。

阿美族太巴塱的祖屋也是國寶（圖 7、8 圖片由我繪製）。當時的民族所建築蓋完了以後，旁邊還蓋了一棟阿美族的祖屋，就在胡適紀念館斜對面那塊空地，請大頭目跟五、六個人坐飛機來南港，還載來所有的草和材料，竹子則是南港當地的。凌先生為甚麼要蓋這棟呢？因為從 *kava drinking* 得到啟發——玻里尼西亞的「*kava* 酒會」，他認為中國古代的酒會居然也在阿美族發現了。他要老先生們講述這個酒會；有個聰明的雙語報導人，爸爸是日本人、媽媽是阿美族人，會講臺語，跟我很要好，他報導的酒會細節非常詳細，例如頭目坐哪裡等等。沒想到最後他說——酒會的事情都是他自己編造的，因為可以免費坐飛機來臺北兩次！凌先生知道很生氣，花了那麼多工夫，卻得到編造的故事。

圖 6　太巴塱的祖屋
（任先民 1958: 圖版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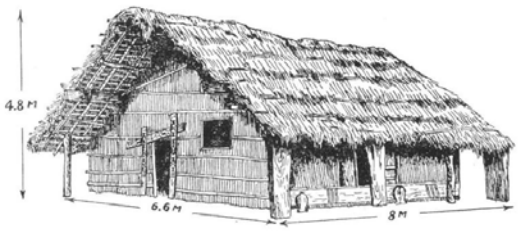


圖 7　太巴塱祖屋手繪圖
（吳燕和繪）[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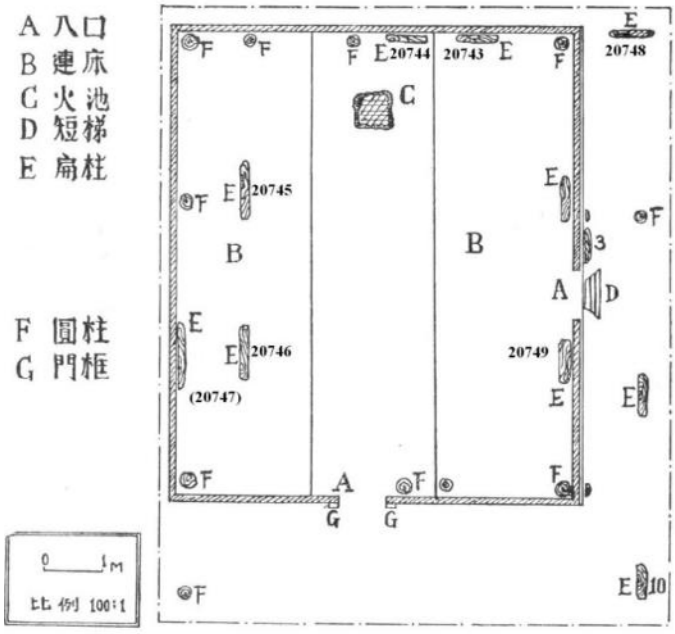


圖 8　太巴塱祖屋的平面圖（吳燕和繪）

我覺得凌先生對所內最重要的貢獻之一是樹立規則。當時剛來的助理們都要幫忙蒐集「標本」，他們到哪裡、看到什麼，只要是「高山族」就蒐集，真的蒐集很多。但凌先生立下一個很重要的規則：大家只能替所裡蒐集，看到好的不可以放到口袋，

2　圖 7 跟圖 8 皆引自任先民 1958：圖版參。

或是拿回家去，因為當時標本太便宜了。我記得工作頭一、兩年，我的薪水一個月是四百塊臺幣，而老佛爺木雕可能最多只付了一千塊臺幣，不過這是我的猜想。倒是後來我發現房屋的橫樑很貴。（在田野中）我都學任先生的那套說詞，特別強調我們是替國家做事，保證這些蒐集來的標本會放在博物館，我們沒有錢，政府也很窮，所以都是幾千塊錢就買了。像是泰雅族的貝珠衣，磨出小珠子編成的衣服，你想那需要多少工呀，幾個月才能做出來。我負責買過一件，對方問你要多少？我說「不要太貴啦，我們這是中央研究院的學者，沒有錢。」對方回說：「那好啦！一百塊啦！」他只要一百塊，我也不能多給。有的賣家比較厲害，說要五百塊，我們的翻譯也很好，就說：「五百塊太多了，他們是中央研究院的學者，兩百啦！」所以當初這些寶貝（購入價格）真的很便宜。

三、我參與的田野調查與研究工作

（一）我與任先民先生及兩位泰雅族人在南澳、花蓮、太魯閣的田野調查

我在民族所工作後，凌先生派我跟任先生去做（探勘）調查，那一趟先去南澳，後來到秀林鄉，當時太魯閣正準備開發，我們也上山調查。我們一路到了花蓮、臺東然後到屏東。之後還去了（桃園）角板山，老總統的那個別墅附近（按：蔣介石總統的行館，（今）角板山賓館），去了差一點被抓起來！那邊是山地，泰雅族的部落在裡面，進去要入山證，而我不知道那是總統的別墅，拿了照相機拍照，馬上就有穿中山裝的出來問我們是做什麼的、從哪裡來的（後來我去大陸做研究，發生很多類似情況）。我們說照相機都對準山的那邊，沒有照總統的別墅，才化解此事。總之，我們就是去探險的。

這張照片（圖 9）是任先民照的。之前博物館的記錄以為中間穿著西裝的是任先民，其實左邊兩位是嚮導，他們是南澳的泰雅族，我在右邊。中間這一位會雙語，除了日文還會一點臺語。我們到處找村落，有的時候連路都沒有，例如這張（圖 10）是往太魯閣山上的兩個村落，照片裡面兩位嚮導跟我，我負責照相和繪圖。找到了以後，白天或晚上就會去敲門，大部分的人不在家，還要用日文大喊「有沒有人？」當地人也被嚇到，甚至以為我是臺北來的大人物——但當時我才 18 歲！例如這張（圖

11）是到了村長家，但村長不在，碰巧他的兒子服兵役回來，穿著士官的制服，他們趕緊叫村長兒子代表，跟臺北來的「大人物」（吳燕和）照相。

圖 9　調查人員吳燕和 (右一) 與嚮導
（民族所博物館提供）

圖 10　調查人員吳燕和 (左一) 與嚮導
（民族所博物館提供）

圖 11　調查人員吳燕和 (右一) 與村長家族
（民族所博物館提供）

（二）拍照與繪圖：田野調查的記錄工作

接下來我要誇耀一下——我當凌先生助手、當任先生助手時，畫了很多圖。這張（圖 12）可能是我拍的照片，當初覺得很新奇，女人搬運東西都扛在頭上，就把他們畫下來（圖 13）。為什麼要這樣畫？當時製版的技術也很差。光是照相，質感黑黑的。這樣做（手繪），將來的民族學報告就會很漂亮，看得很清楚。這些都是鋼筆畫，沒有人教我。

圖 12　女性頭頂負荷搬運
（民族所博物館提供）

圖 13　頭頂負荷物品的婦女
（吳燕和繪）

民族所很多標本來自佳平，當時雇了許多人來包紮、捆紮，一路走路運到潮州，早上出發走到晚上，有的是三、四個女人聯合頂著大柱子、大雕刻運來的。我們先走一段，然後坐一段公車，一路到潮州。從潮州再用火車一路運到南港站。然後大概是鄭格找人來接，送到中研院。請看（圖 14、15）他們的車、用車的細節，所裡一些大標本都是這麼運回來的，畫出來以後才能夠把細節的地方呈現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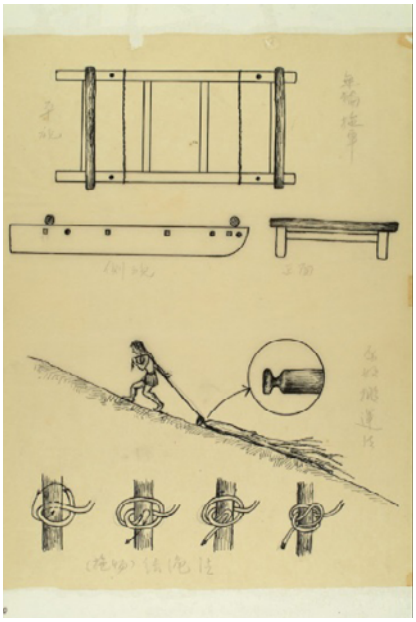


圖 14　搬運方式（吳燕和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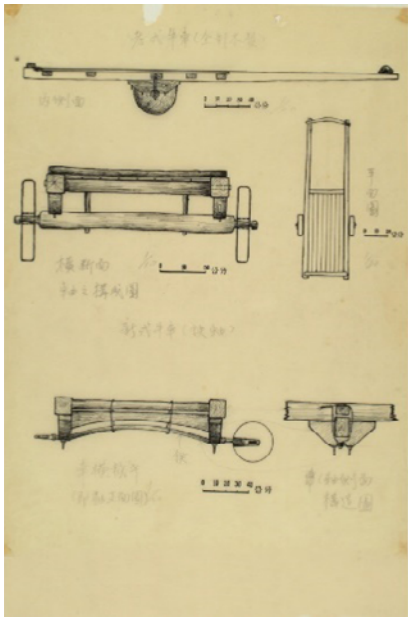


圖 15　老式牛車（吳燕和繪）

民族學調查包括各種生產工具、各種家屋、怎麼起火、飲食的工具、衣服，還有小米！當地人可以說出十幾種來，而我們怎麼看小米就只是小米，任先民拍照拍不出來，都是黑黑的，所以由我畫出來（圖 16）。當時村落內有各式各樣不同的家屋，從古代的石板屋一直到現在，我都是測量以後才畫下來（圖 17）。我哪裡得到的靈感呢？沒人教過我，我到所裡看到了千千岩助太郎畫家屋的書，於是就把村子裡看到的不同型態的家屋畫出來。這些畫我從十八歲到現在從來沒再看過，最近才發現，收錄在任先民的草稿（manuscript）。好像三十年前拿到所裡要出版，由張恭啟先生負責，但後來他過世了，那份草稿也遺失了。最近任先生捐給臺東史前博物館，他們預計要出版，先借我看（圖 13-17）。

圖 16　不同種類的小米（吳燕和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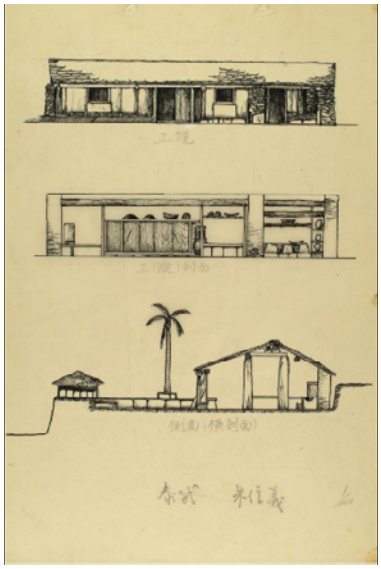


圖 17　傳統家屋（吳燕和繪）

（三）我所參與的大型田野調查計劃（1958-1961）：花蓮阿美族馬太鞍與太巴塱部落

馬太鞍的調查是所內第一個大計劃，帶隊的是劉斌雄先生，還有丘其謙，當時他已經得到碩士學位[3]，是所內的助理研究員，此外還有我的前輩王崧興，那時是研究

3　丘其謙於 1959 年取得臺大人類學系碩士學位。

生。所有教授的子弟兵都去了，例如石磊是石璋如先生的兒子，陳清清是陳紹馨教授的女兒，凌曼立是凌先生的女兒。這張相片很寶貴（圖 18），我猜是可能是劉斌雄照的，左邊是我（那時候還沒有進大學），右邊是陳清清，中間則是溫遂瑩。

圖 18　調查人員實習舂米
（民族所博物館提供）

這兩年的時間，我先是一起去兩次光復鄉，後來跟王崧興又回去好幾次。當時我們不但去「搶救」所謂「傳統的文化」，也拍攝受到天主教影響的影像記錄。我的工作包括把當時原住民所使用的工具畫出來。這幾張（圖 19-25）主要是給大家看看我畫得多好——這是十九世紀的傳統，還沒有照相機時候都是靠畫的；凌先生的民族學很受法國十九世紀影響，所以我就拚命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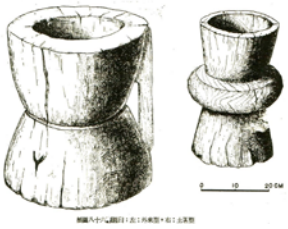


圖 19　圓臼
（吳燕和繪，李亦園等 1962: 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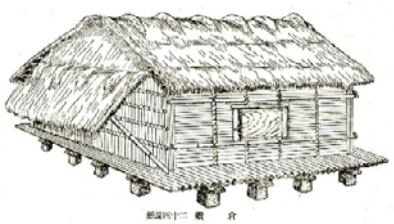


圖 20　穀倉
（吳燕和繪，李亦園等 1962: 182）

圖 21　置物筐
（吳燕和繪，李亦園等 1962: 2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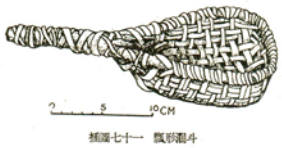


圖 22　瓢形漏斗
（吳燕和繪，李亦園等 1962: 234）

圖 23　飲食用具
（吳燕和繪，李亦園等 1962: 1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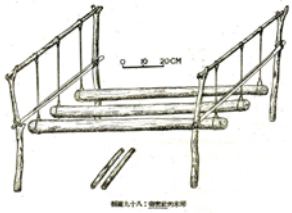


圖 24　木琴
（吳燕和繪，李亦園等 1962: 3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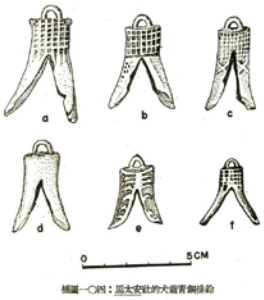


圖 25　犬齒青銅排鈴
（吳燕和繪，李亦園等 1962: 359）

圖 26　馬太鞍傳統領袖大禮帽
（吳燕和繪，李亦園等 1962: 125）

這是代表大頭目權威的大帽子（圖 26），我當時很欣賞，自願畫的。現在無法想像當初是怎麼畫出那一根根羽毛的。這張圖不管到哪，我都要版稅的（笑）。

凌先生也派我去調查歌舞。凌先生愛唱歌跳舞，這只有我知道，他曾跟我講：「你知道我會彈琵琶喔！彈琵琶有兩種方式，一個是從小拇指出去的，一個是大拇指出去的。」接著他就站起來，開始講他的苗族調查經驗，並叮叮咚咚地跳起來。總之他要我去做歌舞調查。那是我還沒進臺大前所做的調查，《馬太安阿美族的物質文化》（1962）中歌舞的曲譜（圖 27）是我自己發明的。說不定我反而要跟原住民收版

稅才對耶（笑），因為裡面記錄的最古典那支，後來演化出所有今日阿美族的歌舞。像是「那魯灣」，源自我記錄下老太太們表演跳的，但多年後回想，當初好像搞錯了。大家有沒有發現那魯灣歌曲中，拼命在叫我的名字（此時老師開始唱起歌曲，並於句末唱到「yan-ho」，發音近似「燕和」）。這是我的猜想：現在不管什麼族唱這個那魯灣，「燕和～燕和～」的，都是在叫我。[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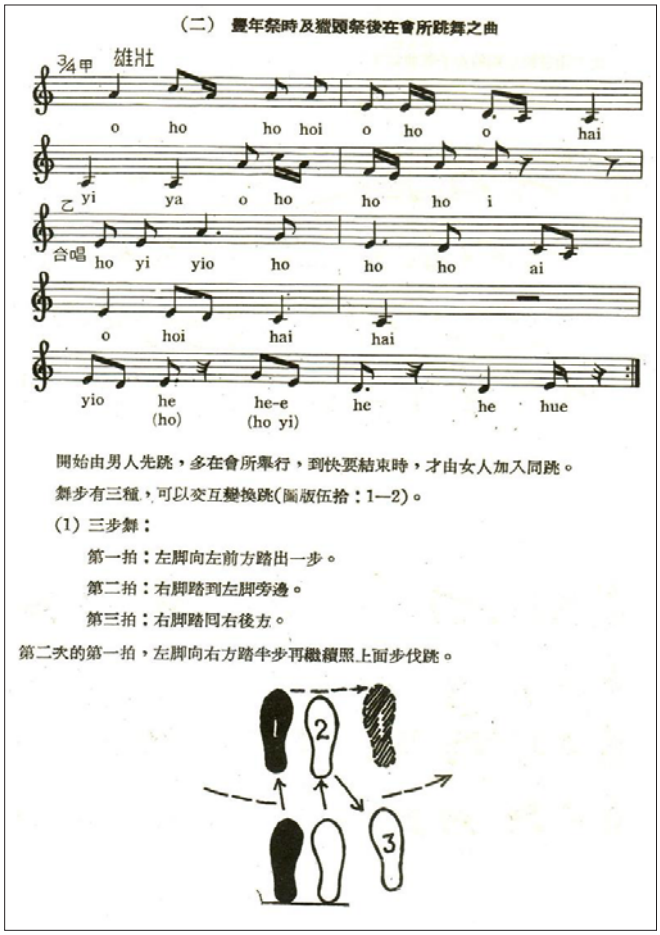


圖 27　吳燕和樂舞記錄
（李亦園等 1962: 376）

4　編按：這兩段為吳老師的幽默，並非真的主張版稅，或認為「yan-ho」就是「燕和」。

（四）我在南澳的田野調查工作

我大概二年級時，開始參與李亦園先生帶隊去南澳做的調查，大二、大三也自己去過，又畫了很多當時泰雅族的工具。我們很仔細地做民族誌，包括跟著報導人到山上，看他們怎麼種田。這張照片（圖 28）是研究人員與泰雅族的合照，最左邊是我，中間那個年輕人是一個翻譯，其他的是來表演種田的泰雅族農民。

圖 28　調查人員吳燕和（左一）與農夫合照
（民族所博物館提供）

三年級時我出版了一篇關於泰雅族的兒童教養的文章[5]。這是從我的興趣出發所做的研究，我訪談一位村落最老的老太太，詢問從生小孩到怎麼教養小孩的過程。當我跟她說想要知道怎麼生小孩，要請她回答，沒想到老太太請她女兒來報告，而後竟然還把衛生所的兩個護士找來，跟她們說有臺北的大學生要來研究生小孩，她自己可能做的不對，到時候可能要她們來表演。總之，老太太先表演給我看，也因此我們坐在地上。這張照片（圖 29）在博物館影像資料庫寫成「研究人員休息」（按：「調查人員吳燕和（席地而坐者之左）與報導人乘涼」），其實是報導人在表演生小孩！

5　〈泰雅兒童的養育與成長〉（1963）。

圖 29　報導人表演生小孩（調查人員吳燕和為席地而坐者之左）
（民族所博物館提供）

（五）我在金峰的田野調查工作

有另一張資料庫的照片簡介也是「研究人員休息」，這張照片（圖 30）確實可以說是休息，為什麼？那是我在金峰鄉的調查研究[6]，一個人去臺東做了兩年的田野工作。我都是晚上才能去人家家裡，訪問那些老太太，或是找個男性報導人請教一些問題。兩年的田野工作結束後，要臨走之際，他們告訴我：「你知道你有一個外號嗎？」我說：「什麼外號？」他們講了一個很長的字，我已經忘記那個字，但大意是說：我是一個「沒有用的人，天天坐在那裡隨便講話」。

6　這趟金峰鄉的田野調查，後來於 1964 年出版成《太麻里溪流域排灣族田野調查簡報》一書。https://tm.ncl.edu.tw/article?u=019_001_0000257808&lang=chn。

圖 30　調查人員吳燕和（左一）與閒暇時的村民
（民族所博物館提供）

我在金峰的田野住在一位老太太家中（圖 31）。起先不知道她的身份，田野一開始，我便四處訪談與疾病和巫術相關的問題，有次她問我為什麼找那個誰誰誰問，並提到她也會這些，後來我才知道她是巫師，向她請教。至於一開始為何沒說？原來是當時部落已經信奉天主教，傳統儀式被教會禁止。我後來發表關於排灣族巫醫、巫術的報告，她是非常關鍵的報導人。她將所知道的事情都告訴我，有時候講到一半，翻譯會跑過來問她：「妳不是說一定要真的神來，妳才可以講跟唱（祭詞）的嗎？怎麼妳正在唱？難道妳以前騙我們嗎？」很有意思。

圖 31　調查人員吳燕和（右）與巫師 Livas（左）合影
（民族所博物館提供）

已經一個鐘頭了，最後我還要講幾句關於任先民先生。任先生是一個非常有辦法的人，他的法寶很多，大家應該要佩服任先生。現在只有我知道他的真實歲數，他一定少報很多很多——當時到臺灣的外省人，高興報幾歲就幾歲，（現在）任先生八十多歲了，快九十了。當時他隻身在臺，但有兩個有力的家族長輩。他帶我去做田野工作、教我東西，方法很簡單，他說：「你們年輕人可能不明白，我調查給你看，我怎麼問，你就這麼問。」

此外他要我唸兩本書，一本是英文的 *Notes and Queries*，第二本你們都恐怕沒看過那個法寶，那是二次大戰期間，美軍打到一個地方後，軍隊裡面的人類學家使用的風俗調查手冊，比 *Notes and Queries* 還厚。那本書幫我很多，任先民不管到哪個村莊，我就坐下來訪談那些大頭目，他的 manuscript 和民族誌，很大一部分資料是我訪談的。

總之，當時在民族所工作，做了很多很多事情，也沒有想到凌先生要我去考臺大，順利考上，過了一輩子愉快的生活。非常感謝大家。

四、問與答

主持人郭佩宜：

非常謝謝吳教授，時間掌控竟然這麼好。我們還有大概半小時的時間可以繼續聽他講古，不知道同仁有沒有什麼好奇、想要多瞭解的地方，或是覺得剛剛的料沒有爆到的地方？

何翠萍（民族所研究人員）：

謝謝吳先生的演講，實在是太有意思了。我很好奇的一點是，您剛剛說很多的標本，甚至連那麼大的木料，都有可能是女人從山上扛下來的。我們都對標本採集的過程非常有興趣。當時他們跟你們講價錢的時候，例如那種木雕，會是男人跟你們講價錢？還是女人跟你們講價錢？然後為何後來會是女人扛下來，是因為男人都跑到山上去工作了嗎？那些木雕從前大概會有某種神聖性（sacredness），如何處理？

吳燕和：

妳問了很重要、很好的問題，也是很複雜的問題，但是我不一定能完全回答。我們那時候開玩笑說幾塊木雕是老佛爺、小佛爺，確實因為都是「神」。

我為什麼畫那個運輸工具？因為我發現，大的東西要運的時候，男人有辦法拉，或者用各種方法從山頭拉下來；但是一到平地，有時候車也不行——不像現在很容易租車——不能立刻去屏東找卡車，人家也不敢給你。我說任先生很有辦法就是這樣，我們能夠協商（negotiate），此外也有很好的嚮導。有時也不是嚮導，像在潮洲，潮洲鄉山地科的一個科長，凌先生每次去的時候，他都會自動趕來跟著我們一塊去，參與談判之類的。全村的人不但認識我們，大頭目家也對我們很好，我們有什麼事，只要跟他講，他一下命令，頭目家下面的人就會來幫忙。而我們花很少的錢就可以了，那個時候十塊臺幣就很大，因為根本沒有 cash，一下子能賺一佰塊錢在當時很不得了。（我一個月薪水是四佰塊）

我曾參與運送一大批陶壺。常常是山上有山坡，山坡之後又有小山坡，到了平地以後，事實上也是高高低低。所以我在想，用頭上扛這招，說不定是女人自己建議的。我們看到四個女人排成一排，他們先蹲著，把物品先放在一個稍高的地方，然後一二三就這麼把物品抬起來、往前走。要休息要停的話，可能要喊口令？我不知道他們怎麼協調的。陶壺平常都是拿來裝水的，我不知道他們有沒有拿東西來平衡，不過搬運時有製作草編的墊子，再把陶壺放上去。

劉璧榛（民族所研究人員）：

謝謝吳老師今天非常精彩地帶我們走過五十幾年前的歲月。我非常好奇是在太巴塱的調查，跟劉斌雄老師一起去的那趟。我想多聽一些有關於那個 Kakita’an 門板的故事，因為大部分都是聽劉斌雄老師在說。

吳燕和：

我很高興劉斌雄老師有跟你們談到這個。當時去做研究的時候，那原本不是重點，當初去採訪神話，畫的都是他們怎麼樣從海上來、洪水、姐妹結婚等，講故事的過程我有親自參加，因為很好聽。但是凌先生突然發現「酒會」很不得了……這部分

完全是猜測，因為憑良心講，我很少跟一個老師這麼接近、這麼親近，因為他比我大很多，把我當一個小孩子似的，一開始我也不是正式的學生，所以什麼都跟我講，可能不能跟別人講的也都給我講。我認為，他眼睛裡看到的是新型的中國社會。我們從古代的巨石文化和石器時代一直發展至今……到了臺灣，發現周公（先秦）的那一套竟然在臺灣恢復了。我跟凌先生學的是，底下一層是小黑人（Negrito），然後再來就是現代的人，跟中國古代社會。所以從那裡開始對於這些酒會和領袖制度感興趣。我前面說他被騙，凌先生很失望，但也毫無辦法了。那一位年紀大、又會講日文又會講臺語的報導人，我只記得他姓陳，大頭目則姓柯，頭目完全不會講國語。這位陳先生非常聰明，我記得他畫了十幾張圖，關於他們哪一個神的生日什麼時候、他們要怎麼坐、誰坐在哪、而誰坐在哪。我親眼看到，因為我是負責畫畫的，我跟他在那畫，也記錄到幾月收穫季的時候，誰要坐哪邊。甚至還表演會所的青年人進來的時候，手的姿勢要怎麼樣——是用近似爬行的方式，但不是真的爬著進來，而走的時候要退出來，就好像去見英國女皇那樣。我不知道他哪裡得到就這些。後來我相信他們發現那個祖廟越來越重要了。因為民族所特定耗費兩次飛機，把老人帶來民族所蓋祖廟，也才引起後來年輕人的注意，覺得這個非常的重要，開始注重這個房子。當然這是很重要的，我只能夠從我的經驗，跟我的感想來看。（編按：劉璧榛詢問的是太巴塱 Kakita’an 祖屋雕刻柱來到民族所博物館典藏的情況，吳燕和老師回答的則是關於馬太鞍族人來中研院建造太巴塱祖屋的脈絡。）

黃宣衛（民族所研究人員，時任博物館主任）：

謝謝吳老師精彩的演講。吳老師見多識廣，想請教民族所博物館有什麼地方是可以改善的？包括您剛才講到文物的蒐藏，很多記錄可能有偏差，或者說我們的展示，或說未來的發展，能不能講一講你的看法？謝謝。

吳燕和：

謝謝你，這個題目非常重要。當時我沒想到我的工作會牽涉到後來的博物館。我們長期都用「標本」這個字，有大有小，我還收過很多那種小小的、人家戴的，我會問說：「唉～要不要賣？」有的人很好，就說：「不用啦！送你啦！送你啦！」於是

收到一些很簡單的東西。當時跟著凌先生，感覺他說不定是受到大英博物館等館舍的觀念所影響，好好保存了當地——不管是原住民或者漢人社會——早期的東西。

我到處看了這麼多地方，博物館也好，美術館也好，還有現在我們夏威夷最有名的玻里尼西亞文化中心——活的博物館，亦即把文化和生活展示展演出來，我相信現在博物館有個困境。檀香山美術館差點關掉，經費本來就不夠，都是靠募捐，現在經濟這麼差捐不出來，怎麼辦呢？只好一天到晚辦活動，每個禮拜天搞活動，這個那個。本來讓小學生來參觀和討論，現在已經幼稚園也要到博物館去。

所以黃先生的問題，一方面是博物館的前途，就內容、展示、蒐集、記錄，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民族所是一個研究機構，博物館只是我們碰巧運氣很好，有像凌先生、李先生、任先生，還有我這種小跟班，能夠在當時蒐集這麼多最好、最好的東西。但未來再怎麼蒐集和展示？確實是一個問題，除非讓博物館跟哪一方面合作。

在外國的話很簡單，找一個有錢的大老——我非常佩服日本，不要說什麼國家、縣，到鄉級的文化歷史博物館，都能把你嚇死。房間設備要好，為什麼呢？背後總是一個有錢人，他在死之前說：「好了，我的收藏品交給你，然後給你一億、兩億，反正我的子女都有錢，你拿去就是負責保持。」我們有沒有這樣子的辦法？也許我們這個文化……老早老早我們老師都講，中國人只蓋廟，不蓋學校。

我簡單的看法就是，一個博物館怎麼活用？所長啊，我們欠不欠經費？怎麼樣用博物館來搞活經濟？怎麼樣能跟哪些觀光局合作，或者跟現在的陸客說：「這是一個點，不來看不行，來一趟五佰塊。」怎麼樣表現我們臺灣最好的一個收藏。我知道博物館還要花很多很多功夫，是吧！整理什麼的，我們的空間，這個也許等會我們再繼續討論，那恐怕要諸位同仁、諸位老師學生們，都要幫著來想。

陳文德（民族所研究人員）：

民族所還有另外一件國寶，也就是您畫的那個佳平（Kaviyangan）雕刻。是不是可以請吳先生對於那件的來源再說明？顯然是從排灣族來的……排灣族是貴族社會，這一定是很珍貴的。這樣的木雕當時怎麼會到民族所？因為相對於（太巴塱）Kakita’an 的木雕我們大致有一些訊息，但是關於這一件木雕，是不是可以請您講一下？

吳燕和：

您說的是老佛爺吧？第一點，這個木雕已經收到所內兩年之後，我才到所裡，所以當時經過我不知道。但是我聽凌先生講過，最主要是佳平部落搬了兩次，最早從大武山下面那個最老的部落被強迫搬下來，其實我相信日本時代已經開始計劃要怎麼樣把他們遷下來。他們最老最老的部落，搬下來到舊佳平，然後舊佳平才搬到現在山坡的那個新佳平，後來是否還有變動我就不清楚了。

1958 年的時候，我跟任先民兩人花了一個禮拜走路進去（舊佳平），那時候都沒有路，只有日本的產業道路，只有一種交通工具「*ti-a-ka*」還可以通。我們走的路有時真的很危險，我記得還差點掉下去。舊佳平還不是最老的部落，那些房子都已經開始垮了。因為搬掉了，對他們來講，除了大頭目家之外，一般的小頭目我們在看，對他們來說沒有那麼重要，一定要恢復。

第二點，我相信天主教是個重要的因素。1958 年去調查的時候，村子裡可以說差不多都是信天主教……天主教力量很大，給的好處很多。以前我小時候，臺灣有很多人去信天主教、基督教，說他信的是「麵粉教」，因為可以領麵粉。這引起我對當時山區天主教傳教士的一些負面看法，當然一方面他們可能對教育有很大貢獻，但是就「破除迷信」這點，損害了原住民的文化，信仰就更不必提了。傳教士會說：「你們那些 *palisi* 都是迷信，太壞了，真的神在這裡，所以老的東西可以丟掉了。」在臺灣還好，沒聽說過把祖先的東西都拿來燒掉的，我在巴布亞紐幾內亞親眼看到很多地方的天主教教士，把一些很老的精美雕刻成堆的放火燒掉。後來人類學家試圖出來干涉時，已經來不及了，當地人說：「有人幫我們燒掉了，這是改掉『迷信』。」

佳平村信奉天主教，是西班牙的教派。最重要是，神父為了研究排灣族的文化，把老頭目一些最好的珠飾衣服、銀器、珠寶等，帶回西班牙，但研究完了一去無回。從 1958 年以後，從來沒見過，現在已過世的老頭目就坐在那邊，跟我說怎麼辦？但我也不知道怎麼辦，因為他已經回西班牙。天主教影響之大，現在的認同復振對年輕人第二輩、第三輩更重要了。當時這麼一塊木頭可以賣一仟塊，我一個月才賺四佰塊，他當然賣給你嘛。

黃啟瑞：

吳老師您好，因為我有參與人類學百年展的策展，在過程中聽臺博李子寧老師提到說，因為臺博館的東西主要是日據時代蒐集的，那他揣測是不是在日據時代，有一些精品他們沒有收到，反而在民族所進到田野的時候收到了？根據老師自己的觀察，跟當時臺灣的社會處境是否有關？因為同時在這個時候也有不少「山胞居住環境改善計劃」等，那是不是錢變薄了，於是民族所可以買到比較好的東西？

吳燕和：

Yes and no。Yes 就是說，凌先生他們到泰武鄉和來義鄉，而且在第二次搬遷前先進去搶救出來，才搶到那件國寶。但是民族所的歷練有限，你說就靠李亦園、任先民和我這種小跟班，以及一些女士們、鄭格等，做不了多少事情。其實還有很多國寶在。當然那一件老佛爺最特別，你現在全臺灣找不到有這麼好的。你們看到那些日本時代的調查報告，很多人是私人有興趣，他也不是人類學家，也不是民族學家。千千岩助太郎也一樣，他走遍全臺灣去畫老的房子，包括漢人跟山地的，然後最後再把它拿出來。

我說 no 是什麼呢？後來等民族所收了這批以後，有些臺灣所謂的「文化人」知道了，特別是在日本讀書的人。例如我父親有個朋友就變成山地文化收藏家了，他是臺中中央書局的老闆（莊垂勝），是我爸爸在東京的同學。因為日本的教育，從明治到大正時期，對「土人文化」和太平洋文化的發展有瞭解，還有從藝術、文藝、文學的眼光認為要學習「土人文化」，所以在那個情形之下，民族所收完以後，就有些私人到處去收了。有的人帶著商業眼光，例如北投有好幾家私人博物館，有一些本是商人而後變成博物館，有的也不知道是商業還是怎樣，我也去看過，他們收到不少好東西。民族所給一仟，他可能給一萬，然後他賣多少呢？十萬。現在的話不用講了，一佰萬、一仟萬都有可能。

我特別知道有個私人收藏家——二十年前有人找過我，說臺灣有一位很重要的臺灣山地文物的收藏家，能不能安排他來東西文化中心做一個大型的展覽？我回臺灣

的時候，教育部長（郭為藩）找我去看，我大致上就瞭解了他的做法：每當村子的老房子要拆的時候，他會說「我給你蓋新房子，你那個破的木頭我拿去」。這些舊木頭上的雕刻之好，而且材料又好。我二十年前去的時候，那個收藏家的倉庫有二十多根木雕，每個都有差不多四、五公尺，甚至更長就像圖騰柱那樣，可能是後來新雕的作品。民族所很幸運搶救了一些最重要的文物，包括泰雅、阿美等，而且是學術性的蒐集。他們那種則是不管，只要有好東西就去收，也沒有什麼記載，很可惜。

某位訪問學者：

我的問題是，博物館蒐藏的東西是一個物質，而到博物館的過程，不光是一個物質在空間上轉移，至少在交易完成那一刻，雙方所秉持的時間觀是不一樣的。對於原住民來講，他是當下的一個物質觀、是活用的。對於人類學家來講，會把物質放到一個另外一個時間序列去考慮，中間那個時刻的時間觀有落差。這種物質品的時間落差，是不是應該納入現在很熱門的學科倫理的討論範圍？會怎麼來處理這個時間差的問題？謝謝。

吳燕和：

妳這是個大問題，我沒有做過時差的這個研究。然後我可以說，個人的觀察發現，任何的物（object），特別現在大家對物質文化那麼注重，它代表很重要的象徵、象徵意義。內容也許可能很重要，有的也可能沒有什麼特別。妳說的時差，有個集體的、大家公認的象徵意義，但也有很多個人的象徵意義。然後過了一天的變化、過了一年的變化，甚至整個社會的變化，這是很大很大的一個問題，所以這個我不能回答。我想在座的這個老師和同學們，我相信你們也可以繼續討論這個問題。

郭佩宜：

非常謝謝吳燕和老師今天跟我們講了這麼多精彩的故事，帶我們回到五十年前，不論當時的田野方式、蒐藏方式、研究方法，或者與原住民之間的關係等，都跟今天有相當大的不同。我想年輕一點的同仁，應該從中也學到了不少；比較資深的同仁，也可以懷舊一下。最後也談到了物的生命史，其實吳教授今天的演講，讓我們理解當

時在原住民部落各種各樣的物，如何在當地社會被理解，又如何進入到民族所的時空。這些物的生命還是不斷地再延續，重新再被創造當中。今天的時空之旅，大家收穫都很豐富，最後再掌聲謝謝吳老師，謝謝。

參考書目

任先民

1958　花蓮縣太巴塱阿美族的祖祠。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6：79-106。

任先民、吳燕和、傅君

2012　屏東縣排灣族民族誌影像圖錄。臺東縣：國立臺灣史前博物館。

吳燕和

1963　泰雅兒童的養育與成長。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16：163-211。

吳燕和、王維蘭

1996　臺灣排灣人魔眼神話與波利尼西亞馬納信仰初步比較。刊於中國神話與傳說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李亦園、王秋桂主編，頁 681-692。臺北市：漢學研究中心。

李亦園等

1962　馬太安阿美族的物質文化。臺北市：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凌純聲

1956　臺東的吐舌人像及其在太平洋區的類緣。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2：137-152。

1958　臺灣土著族的宗廟社稷。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6：1-57。

延伸閱讀

吳燕和

2006　故鄉・田野・火車：人類學家三部曲。臺北：時報出版社

2012　ふるさと・フィールド・列車：台湾人類学者の半生記。東京都：風響社。

2023　行健自強：巴布亞新幾內亞的華人。上海：中西書局。